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下载链接1](#)

著者:步阿吉尔贝尔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1984年10月

装帧:平装

isbn:

英国和法国都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源地与故乡，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相互影响。例如，亚当·斯密于1764年到巴黎旅游时，曾同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魁奈和杜尔哥有过亲密往来。斯密虽然并不同意重农学派把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的观点，但他受过重农学派的影响，并给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①斯密对法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西斯蒙第也发生过重大影响。后者的早期经济研究基本上接受了斯密的学说，后来他的经济学说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仍然继承了斯密的一些观点。当然，由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英法两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不同，加上两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个人情况的差别，使英法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这种特点在两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著作中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后来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更表现为尖锐的对立。马克思曾指出：“对配第和布阿吉贝尔两人的著作和性格的比较研究，——暂且不谈这一比较将异常清楚地说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英法两国的社会对立——将是对英法两国政治经济学之间的民族对立的起源的叙述。这种对立最后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之间又重新表现出来。”^①收进本书的布阿吉贝尔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和十八世纪初年写成的。当时在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在政治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正处于全盛时代。而在法国，经过贵族和国王之间的几番较量之后，才终于确立起封建专制政治。在路易十四执掌政权之后，也就是布阿吉贝尔生活年代，封建专制政治达到高峰。路易十四执政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初任马札里尼（1643—1661年）为首相。马札里尼全力加强王权，并在死后为路易十四留下了一群听话的臣民、被驯服的贵族和被压制的高等法院。他为国王培养了一批有经验和惯于处理王朝行政的官僚。君主处于绝对权威地位，任何人对政府有所非议都会被投进皇家监狱无定期地监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路易十四的王朝宫廷中聚集着一大批贵族、贵族夫人和朝臣，他们过着穷侈极欲的生活，挥霍无度。路易十四的前半期统治主要依靠马札里尼所培养出来的一些大巨，在军事方面有勒泰利埃和他的儿子鲁佛瓦，在外交方面有利奥内和邦本，在财政、海军和经济方面有科尔贝。科尔贝是最活跃和受宠的大臣。路易曾为他特别设置财政总监的新职务。他除本身职务之外，还兼任两个大臣职务，实际上在马札里尼之后，法国全部内政事务都集中于他一身。路易十四和他的许多大臣、官吏对于工商业都是外行或不感兴趣。而科尔贝出身于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兰斯的呢绒商，因此他对工商业特别感到兴趣。科尔贝在主管法国财政经济时期并没有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上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他不过厉行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已经出现和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众所周知，重商主义认为金银货币就是财富，一国最重要的就是尽量积累金银财富。在对外贸易中应想方设法打击对手，赚取利润，使别国的金银源源流入本国。在科尔贝看来，金银财富标志着国家的富足和强大，但“我们不能增加白银，除非同时把邻国的白银减去相等的数量。”从这一观点出发，科尔贝提出和推行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诸如提高外国工业品的进口税，对外国船只进入法国课以重税，极力破坏外国商品的输出和外国商人的贸易，尤其是荷兰人的海上贸易，同时鼓励本国工场手工业制造工业品。并力求提高工业品质量，以满足法国近东各国的老主顾的需求。在科尔贝的积极倡议下，法国创办了制造各种工业品的工场手工业，并着重创办制造奢侈品的工业，以防止法国金银外流。科尔贝在鼓励发展工场手工业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创办直接由国家经营的皇家制造业，给予一些工场手工业专利和特权，并给予工场手工业主各种奖励。作为海军负责人，他根据发展对外贸易和争夺海外市场的需要极力扩充和发展海军，例如建立和发展远洋帆船舰队，企图重建地中海舰队，强迫海边渔民和所有水手在船上服役，等等。科尔贝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结果使法国工商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它给予了当时欧洲一般人极为深刻的印象，十七世纪下半叶英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曾对科尔贝的政策和法国工商业的发展称道不置。意大利经济学家孟哥第（Mengotti）把科尔贝所推行的这种主张称为科尔贝主义，后来人们也就把法国重商主义称为科尔贝主义。

十七世纪下半叶法国工商业的发展虽然应归功于科尔贝，但科尔贝的重商主义政策也给法国财政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十七世纪下半期，法国资本主义虽有所发展，但它仍然是封建农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小农在全国总人口中居多数。法国广大农民本来就遭受着封建的残酷剥削，封建王朝和贵族的挥霍浪费和穷侈极欲的庞大开支，基本上都由农民担负。而科尔贝在扶植工商业时不仅漠视农民利益，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不利于农业

和农民利益的保护政策。例如，禁止谷物和原料的自由输出，限制农产品价格等。发展航运事业、在海外设立公司以及扩充舰队等又加重了农民的赋税，加上路易十四继承了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和马札里尼的政策，即每个国家的利益在于扩充自己的领土，同时削弱敌对国家的力量，连续同欧洲的一些国家发生战争，使法国国力遭到很大的消耗。军队的士兵主要由农民充当和补充，庞大的军费开支又不得不靠加紧对农民的搜刮和勒索来应付。从布阿吉尔贝尔著作中就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是税多如毛。在1683年科尔贝死后，法国封建王朝衰落的各种征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封建剥削、连续不断的战争，重商主义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频繁发生的灾荒，使当时还是法国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日益凋敝，土地荒芜，人口减少，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科尔贝政策旨在发展工商业，然而严格的政府管制却使工场手工业不能根据生产需要进行工场改革，一切科学技术和分工的改革都受到压抑。科尔贝虽然也发现了问题，力求提高工场手工业的经济效果，曾花费很多经费派人了解各地技术改良情况，为工场手工业主提供信息，但终究没有收到多大效果。农业破产和沉重的税收使工商业也陷于萧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七世纪末法国各港口和大城市的代表组织的商务会议，把工商业的萧条和破产完全归罪于科尔贝所创立的保护政策。总之，当时法国财政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全国呈现民穷财尽的一片凄凉景象。实行重商主义在法国带来了与英国大相径庭的后果。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在法国社会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开始他的著述活动的。

布阿吉尔贝尔出生于法国卢昂，曾在他的家乡担任法官职务。但这位法官并不是同当时许多法官一样充当封建王朝和贵族的帮凶。他在审理案件中，目睹耳闻法国人民生活穷困和深受奴役的悲惨处境。他对此不是采取明哲保身或熟视无睹的态度，而是挺身而出充当被压迫穷人主要是法国农民利益的辩护人。如马克思所指出：“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①在他所写的这几本著作中，都无情地揭露和鞭笞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漠视农民利益，而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贫困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们把布阿吉尔贝尔和威廉·配第的著作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为小生产者、即广大农民的利益辩护，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英国农奴制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当时，尤其是在十五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在使广大农民破产的同时，使农场主迅速富裕起来。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已产生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经很富有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则转化为低廉的雇佣劳动者。十六世纪末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成为拥有大量财富而地位巩固的阶级，他们再也不需要强大王权的保护。从1640年开始到1688年结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宣告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在威廉·配第的身上就充分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特性，他为人十分轻浮并掠夺成性，他的著作都是为英国统治阶级策划如何对内搜刮、对外掠夺和进行竞争，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形成明显的对立。

任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总是根据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们总是试图从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回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问题。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对当时法国经济状况作了具体阐述，不仅是对法国经济衰落和人民生活困苦表示深切的关注和同情。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是记述法国路易十四时代农民普遍破产和贫困的经济学^①。而且他按照小农经济发展的需要，强烈地要求封建王朝对过去的财政经济政策，主要是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改弦更张，进行彻底的改革。他的著作的书名反映了当时法国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例如，他在十八世纪初叶写的《谷物论》论述了法国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实行重商主义的禁止法国谷物和其他农产品输出，导致法国谷物和农产品价格低廉，农业生产衰退。在这部著作中，布阿吉尔贝尔极力反对科尔贝为了保证工商业者获得廉价的粮食和原料，降低工业品成本而采取导致谷物价格低贱的禁止粮食和农产品输出政策，力主取消禁止谷物输出法令。在《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一书中则尖锐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证明货币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并抨击了当时的赋税政策。《法国的辩护书》和《法国详情》分析了法国如何由一个富足强大的国家走向衰落，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王朝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并提出了改革的建议。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著作，他论述的都是当时法国经济的具体

问题。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他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实际上奠定了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所以，马克思称他为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

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逐渐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在配第著作中就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过渡的痕迹。法国则不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和重商主义尖锐对立中诞生的。布阿吉尔贝尔的全部著作都贯串一种精神，即坚决反对重商主义。他首先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金银货币，国家的基本政策就是尽力积累货币财富。布阿吉尔贝尔同重商主义者相对立，认为凡是能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用他的话说：“财富包括人们的全部享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也包括非必需品以及能够满足人们身体官能快乐的一切物品。”马克思曾指出，“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只看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使用价值、享受”。①布阿吉尔贝尔反复证明货币并不是财富。他说：“硬币本身并非财富，而且它的数量一般和一个国家的富裕无关”，“国民收入的增长与消费而不是与硬通货数量的增加成正比例。”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货币只是在商品流通中充当流通手段，“钱币只是手段和方法，而对生活有用的各种货物才是目的和目标”。布阿吉尔贝尔从货币不过为便利商品交换而产生，其自然职能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观点出发，正确地指出市场上需要的货币数量决定于商品价格的总额。布阿吉尔贝尔还指出，金银并不是唯一充当货币的材料，在历史上有各种物品作过货币材料。在商品价格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货币也可以不用金银来充当，而用纸币来代替。他认为，货币是充当流通手段的，不应加以贮藏，而应该不断地投入流通发挥其作用。他意识到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有所不同。他说，货币“周转多少次数，就更换了多少主人，这就是说它进行了多少次贸易和消费”。“钱币是不会由于使用而消费掉的，它在运入银子的国家产生着无限无垠、无穷无尽的妙用；可是那些作为交换而付给的食物，却只能使用一次，使用之后，效用就消失了。”他斥责重商主义的金银拜物教，得出结论说：“人们日夜当作偶像来膜拜的金钱，实际上本身完全没有任何用处，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将金银当做财富和幸福生活的唯一的源泉是一个严重错误的学说”。布阿吉尔贝尔的财富观反映了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状况，他基本上从小商品生产的角度来考察财富和货币问题，而威廉·配第则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这些问题。虽然布阿吉尔贝尔如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一样都不了解货币的本质与它的职能，只把货币看作流通手段，但他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特点和作用却有不少正确的理解。

布阿吉尔贝尔把财富看作只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认为，这些东西不过是土地的产物。“富裕通常不过是土地的产物。”换句话说，他把财富看作主要是由农产品构成的，农业生产是财富的真正源泉，“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它等级的财富的必要基础。”在他看来，农业衰落，百行百业也就随之衰落。他认为，法国经济面临危机就是由于谷价低贱，农民不仅不能补偿生产成本，连自己的生活也不能维持，同时也不能向地主交租，因而使社会各阶层都得不到好处。他力主提高谷物价格，允许谷物自由输出，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农民增加收入，促进土壤改良，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的产量。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财富的来源是商业即流通领域，特别是对外贸易。而布阿吉尔贝尔则证明社会财富主要是农业中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财富的来源是农业生产。他把自己的经济研究和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①布阿吉尔贝尔在法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最先开始这种转向，所以，他的经济理论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始。他重视农业的思想为后来重农学派所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从而使他成为法国重农主义的先驱者。

布阿吉尔贝尔在论述法国经济问题时多次提出自然规律的概念，反复强调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具有自己的规律性，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律进行。他指出：“整顿经济秩序的权力只属于大自然”，“只有大自然才能够平衡，所以不要妨碍大自然行事”。他一再重申，如果人们违反自然规律行事，“大自然就会对违抗者施加惩罚，不稍稽延”。布阿吉尔贝尔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他认为，人们的经济活动“只有大自然而绝不是政府能够恰如其分地加以必要的整顿”。他要求法国封建政府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停止对自然采取十分粗暴的行为”。在布阿吉尔贝尔看来，实行

自由竞争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用他的话来说，“大自然是酷爱自由的”，“大自然总是走向自由和趋于完善的”。他认为，法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只有自由竞争才能恰如其分地使各行各业保持均衡，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能得到利益；它是维持社会安定和公正的唯一方法和力量。但他的自由竞争思想也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他要求实行有利于法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谷物、高价政策，主张谷物自由输出但禁止自由输入，这显然与自由竞争思想相矛盾。但布阿吉尔贝尔基本上是自由竞争的早期热烈拥护者，他的自然规律和经济自由思想都为后来魁奈所继承而形成自然秩序学说，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十七世纪下半期到十八世纪法国经济发展的特殊状况，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考察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规律，探索挽救濒临破产的法国国民经济的道路上。在一定意义上说，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理论和魁奈的《经济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先导。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对社会结构有明确的观点，但他依据自己对财富本源的看法，把一国的收益分为两类，即土地的产物和实业收益，而后者又划分为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土地的赐与；第二种是这些赐与所由产生的土地所有权，它把利得在地主与佃农间加以分配；第三种是由城市房屋的出租，抵押利息，文武官员和财务人员的官僚及货币和票据所构成；第四种则包括体力劳动和批发零售商业。”后三种是从土地产物中派生出来的，但它们反过来又推动它们所由产生的土地产物的产生。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社会各种收益之间形成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是一刻也不能中断的，因为不管从哪一方面发生些微的停顿，就马上成为双方的致命伤”。虽然布阿吉尔贝尔对收益的分类还很不清晰，但这个分类实际上是后来重农学派主要代表魁奈的社会阶级结构理论的雏形。他关于社会收益之间形成循环的见解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较为完善和明确的论述。

布阿吉尔贝尔在分析法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时还指出，法国国民收入锐减的原因在于消费不足。按照他的说法，“消费和收入只是一种同样的事物，破坏消费就是破坏收入”。“大量的消费会得到大量的收入”。他举出一些饶有趣味的例子来说明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一个短工在上工时先喝一品脱的酒，酒店在卖出酒后就会向农民或葡萄农买进葡萄，而葡萄园经营者也就能够向地主缴地租；地主有了地租收入，就会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进行各种消费，从而给各行各业带来收入。布阿吉尔贝尔实际上阐述了增加消费就会引起收入成倍增加的作用。

布阿吉尔贝尔同威廉·配第一样是近代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中劳动价值论的最早的奠基者之一。他在分析交换中价值的比例关系时，得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马克思指出，布阿吉尔贝尔“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竞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①但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货币使按照这种比例进行交换受到破坏，从而使整个社会商品价值比例失调。在他看来，货币本来只是流通手段，由于错误地把货币当作财富，使货币变成“商业交易的专横暴君”，成为主宰人们幸福生活的神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灾难和祸害。他强烈谴责货币破坏商品按比例进行交换。他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他赞美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却又攻击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对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进行激烈的攻击，对另一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劳动却空想地加以赞美。”^①总之，他颂扬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错误观点为后来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蒲鲁东等所继承和发展。

布阿吉尔贝尔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路易十四时代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赋税制度。他热烈希望改革税制，取消在捐税上的特权，实行公平征税，按照能力大小来负担捐税，富者多缴税，贫者少缴，并清除那些不合理的捐税和征收办法，使广大人民能从捐税的盘剥中解脱出来。布阿吉尔贝尔在自己的改革方案中，主张国家的财政措施都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农民和商人的利益的基础上。事实上，他力图使法国封建王朝的财政政策不损害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尽管他的改革方案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问题，它也不可能为法国封建王朝所采纳。当布阿吉尔贝尔在1714年去世的时候，法国封建制度进一步走向没落。

布阿吉尔贝尔同英国的威廉·配第一样没有创立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但他针对当时法国经济状况所提出的一些观点，例如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竞争、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均衡、消费和收入的关系等问题的见解，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以及对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某些看法，都包含着一定的科学因素，为后来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作者介绍:

布阿吉尔贝尔出生于法国卢昂，曾在他的家乡担任法官职务。但这位法官并不是同当时许多法官一样充当封建王朝和贵族的帮凶。他在审理案件中，目睹耳闻法国人民生活穷困和深受奴役的悲惨处境。他对此不是采取明哲保身或熟视无睹的态度，而是挺身而出充当被压迫穷人主要是法国农民利益的辩护人。如马克思所指出：“布阿吉尔贝尔虽然身为路易十四的法官，却既热情又勇敢地替被压迫阶级声辩。”^①在他所写的这几本著作中，都无情地揭露和鞭笞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和重商主义政策的漠视农民利益，而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贫困农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果我们把布阿吉尔贝尔和威廉·配第的著作加以比较，不难看出两者之间的重大差别。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为小生产者、即广大农民的利益辩护，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英国农奴制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当时，尤其是在十五世纪，英国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十六世纪的土地革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在使广大农民破产的同时，使农场主迅速富裕起来。在十六世纪末，英国已产生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经很富有的“资本主义农场主”阶级。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则转化为低廉的雇佣劳动者。十六世纪末叶，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已经成为拥有大量财富而地位巩固的阶级，他们再也不需要强大王权的保护。从1640年开始到1688年结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欧洲新社会的政治制度的产生，宣告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在威廉·配第的身上就充分表现出了资产阶级的特性，他为人十分轻浮并掠夺成性，他的著作都是为英国统治阶级策划如何对内搜刮、对外掠夺和进行竞争，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形成明显的对立。

目录: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下载链接1](#)

标签

经济学

玄铁书

评论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下载链接1](#)

书评

[布阿吉尔贝尔选集 下载链接1](#)